

# 中国能源安全的对冲战略<sup>\*</sup>

[挪威] 奥斯汀·腾斯强

**【内容提要】** 通过引入对冲概念和风险管理理论,作者建立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能源安全问题,该框架涵盖中国能源安全政策研究中的传统战略和市场研究途径所没有涉及的一些复杂性。这种分析视能源对冲为一个具有自反性和或然性的战略,它同时包含了合作、竞争、摩擦、潜在的冲突和旨在使风险最小化及应对紧急状况等因素。结合国际关系理论中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争论并考察“战略”与“市场”的分析途径,作者认为,中国能源安全研究应超越这些传统研究途径,安全化框架是理解中国能源安全政策的有效工具,但在解释中国能源安全政策时也存在局限。对冲概念与风险管理理论为理解中国能源安全政策提供一个更加透彻的视角。

**【关键词】** 中国能源安全;对冲;国际关系理论;风险管理与安全化

**【作者简介】** 奥斯汀·腾斯强 (Øystein Tunsjø),挪威国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博士。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 - 9550(2008)08 - 0042 - 10

口数是美国的四倍,2010年以后将很快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

## 一 引言<sup>\*</sup>

能源安全无疑影响着中国的外交与战略思考。尽管因石油资源的竞争而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但能源安全正变得与更多的外交议题密不可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6年的G8会议上发表演说时强调:“全球能源安全关系到各国的经济生命线及各国人民的生计,对维持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至关重要。”

按购买力平价法来计算,198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in PPP)占当时世界GDP的3%,2008年将占16%,中国的经济增长迅速扩大了它的能源需求。中国目前每天大约进口350万桶石油,几乎占了其日消耗量的一半。中国在世界石油市场上的需求份额大约是9%,但是在2000~2005年间,中国几乎占了世界能源消耗增长的一半。按照国际能源署《世界能源展望2007》的说法,“中国的人

<sup>\*</sup> 感谢斯文·霍尔茨马克(Sven Holtmark)、塞拉·巴斯特(Saira Basit)、托·维达·麦克兰德(Tor Vidar Mykland)、约翰尼斯·容(Johannes Ro)在笔者准备此文的过程中提供的有价值的反馈意见,也对挪威国防部的慷慨资助表示感谢,同时也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中肯修改意见。

Hu Jintao, Written Statement at the G8 Meeting, St Petersburg (Russia) 17 July 2006, <http://www.uofaweh.ualberta.ca/chinainstitute/nav03.cfm?nav03=48114&nav02=43884&nav01=43092>.

在过去25年多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始终保持了大约9%的增长速度,参见MF,“China's Economic Growth Rates Have Continuously Averaged Approximately 9 Percent for more than a Quarter of a Century,”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http://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com/external/>.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07, <http://www.bp.com/productlanding.do?categoryId=6929&contentId=7044622-33k>; Erica S. Downs, “China Energy Security Series,” *The Brookings Foreign Policy Studies*,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December 2006, <http://www.brookings.edu/reports/2006/12china.aspx>.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World Energy Outlook 2007 - China and India Insights*, Paris: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2007, p. 44, <http://www.worldenergyoutlook.org/2007.asp>.

因此,中国领导人比以前更为关注能源供给安全,特别是国际危机时的石油供给(尤其是涉及台湾问题的时候)。鉴于中国在产油国中有限的权力影响力与掌控力,中国的决策者很关心在这些产油国中,中国石油的供给配额是否会很脆弱。只要美国海军控制海上交通线(SLOC)以及咽喉地带(potential choke points),如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中国就不会觉得安全。

当然,能源包含石油、煤炭、煤气、水力发电、核能以及可再生能源。考虑到中国丰富的煤炭储备,在可预见的未来,煤炭将会在中国的能源结构中居于支配性地位。然而,石油是中国唯一需要大量进口的能源。鉴于此,本文的重点是讨论石油,因为石油仍然是中国最为关切的“安全”层次上的燃料。

我们的分析还做了另外一个必要的限制。本文强调的是保障石油安全供给的措施,主要是中国的海外战略;虽然国内方面仍是中国能源安全政策考虑的重要因素,但本文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对此进行研究。

在研究中国增强其能源安全的举措时,主流的分析往往集中在互相竞争的两个分析途径(approach):一个是“战略”分析途径,另一个是“市场”分析途径。战略分析途径也被称为重商主义(mercantilist)或是民族主义(nationalist)的视角,以零和(zero-sum)和相对收益考虑为特征。能源是国家间冲突的根源之一,一国的所得就是他国的所失。市场分析途径强调正和博弈,认为能源是潜在的国际合作的一个源泉。简言之,能源安全研究的战略与市场分析途径,在很多方面与国际关系理论中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论争联系在一起。

超越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辩论的范围,基于对冲(hedging)和风险管理理论,本文旨在探索一个新的分析途径,以应对能源安全政策内含的不确定性(embedded uncertainty)。简单来说,风险规避就是确保。对冲的概念源自金融与经济理论,是确保风险投资的一种方式或用于减少风险的一种战略。一般认为,阿尔弗雷德·W.琼斯(Alfred W. Jones)第一个提出了对冲基金(hedge fund)概念。琼斯希望他的分析是正确的,并且会顺风顺水。他不是仅仅买了股票就行了,在证券投资组合(portfolio)中,他也将一定比例的资金投放在“短线(short side)”上。也就是说,他确信这些股票会缩水。由于他的短线投资在低迷市场中可能赚钱,因此在他

的长线投资表现不佳时,他的短线投资就会起到保护作用。

正如布里厄利(Brealey)和斯图尔特(Stewart)指出的那样,关键的问题是“找到套期保值率(hedge ratio)或是德尔塔套期保值(delta),即为抵消另一资产价值的变化所需的本资产单位数”。布里厄利和斯图尔特认为,就像任何一位财务经理需要确定一项资产的增值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另一项资产那样,“这需要很强的判断力”。对冲背后的意思是你找到两种紧密关联的资产,然后买进一种资产,卖出另一种资产,其比例要能够使你的净资产的风险最小化。如果对冲战略设计精确,那么,你虽然不能完全排除风险,但你的投资不会因市场波动而严重受损,你最有可能获利。

经济学领域里有应对(address)确定性与机会流失的工具,它们被称为“衍生产品”,因此,大多数金融机构选择涉及衍生产品的最优对冲战略和危机管理方案。但是这一源自金融和危机管理的认识怎样能运用到中国的能源安全政策分析中呢?在能源安全领域,应对不确定性、机会流失与风险的战略是什么?本文认为,中国能源安全政策的对冲战略意味着中国无须在“市场”和“战略”途径间做出选择

Yang Yi, "Engagement, Caution," *China Security*, Vol 3, No 4, 2007, pp. 29 - 39; Zha Daojiong and Hu Weixing, "Promoting Energy Partnership in Beijing and Washingto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0, No 4, 2007, pp. 105 - 115.

Erica S. Downs, *China's Energy Security*, Ann Arbor: UMI ProQuest, 2004, p. 55.

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见: Erica S. Downs, *China's Energy Security*, pp. 164 - 223; Erica S. Downs, "The Chinese Energy Security Debate," *China Quarterly*, Vol 177, 2004, pp. 21 - 41; Xu Yi - chong, "China's Energy Security," in Michael Wesley, ed., *Energy Security in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07, pp. 42 - 67; Kong Bo, "Institutional Insecurity," *China Security*, Vol 2, No 2, 2006, pp. 64 - 88.

Philip Andrews - speed, Xuanli Liao and Roland Dannreuther, *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China's Energy Nee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Erica S. Downs, *China's Energy Security*, pp. 21 - 44.

Robert O. Keohane,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Joseph S. Nye,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World Politics*, Vol 40, No 2, 1988, pp. 235 - 251; David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Joseph Nocera, "The Quantitative, Data - Based, Risk - Messaging Road to Riches," *New York Times*, 5 June, 2005.

Brealey and Stewart, *Financing and Risk Management*, New York: McGraw Hill, 2003, pp. 320 - 325.

以应对不断加深的能源依赖带来的不确定性。此外,通过设计对冲战略,中国可以规避因过分依赖市场机制或战略的得失计算而带来的机会流失。

唐斯 (Downs)指出,虽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一些研究员开始把中国的能源安全战略称为对冲,但是在怎样把对冲引入到安全领域以应对能源安全问题方面,鲜有分析者进行详细阐述。该项议程把对冲观念视为一个具有自反性、应急性的战略,它同时融合了合作、敌对、摩擦和潜在的冲突等因素。它将以未来风险最小化和尽量避免不必要行动为基础,致力发展必要的保障机制。

本文试图提出分析中国能源安全政策的新理论视角 (theoretical lenses),其可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把传统的“市场”或“战略”分析途径与国际关系理论里的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之间的论争联系起来;第二步是要研究哥本哈根学派 (the Copenhagen school)提出的安全化框架怎样才能应用到能源安全分析上,以挑战传统的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研究方法。我们承认,安全化框架是批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争辩的一个角度,也认为它是解释中国能源安全政策的一个工具。但我们的分析会更进一步,在解释中国能源安全政策方面,我们对安全化框架的几个核心假设提出了质疑。我们认识到,安全化框架对威胁与风险之间存在的差异认识不足。第三步将通过引入对冲的概念和风险管理理论,进一步简化 (encapsulate)保障中国能源需求方面的复杂性,并有说服力地提出 (flesh out)关于中国能源安全政策的一个替代性研究途径。

## 二 传统能源安全研究

战略权衡或市场机制的重要性通常 (traditionally)是决策者提出能源安全政策的主要依据。按照安德鲁斯·斯皮德 (Andrews Speed)的观点,中国政府的认知与重点 (priorities)是强调对战略权衡的坚持。《亚欧合作理事会专题小组报告》(CAEC Task Force Report)的撰写者们认为,中国的情况最为明显。他们从战略的高度描述了中国的能源安全状况。该报告坚持认为,中国政府偏好在能源安全上躬身践行,对本土生产与外国投资进行了高度垄断,且加强了与生产国的关系。中国政府正通过政治、金融和外交手段,并辅以商品销售和重大投资来实现自己的能源安全目标。

能源消费国为促进本国的经济增长而互相争夺有限的能源。战略途径强调竞争、摩擦、零和博弈与相对收益的考虑。关于国际关系的这些假设深嵌在现实主义的思想中,作为现实主义的领军人物,肯尼思·华尔兹强调,“当面对为共同获益而开展合作的机会时,感到不安全的国家必须要询问将如何对收益进行分配。它们必须要问的并非‘我们双方都能获益吗?而是‘谁将获益更多?’。例如,如果某一收益被按照 2:1 的比例加以分配,一国就可能利用不均衡的所得,来实行一项意图伤害或毁灭他国的政策。只要每一方都担心对方会利用其增强其能力,那么,即便在双方都能获得绝对收益时也不会带来合作”。因此,从战略分析的角度来看,政府会强调对海外能源进行直接投资,并通过贸易、援助、对外投资和外交支持来发展和能源出口国的特殊关系。

相反,市场途径强调国际、国内能源市场的自由化,一国通过加强信息流动,维持战略石油储备和增加勘探新储备油田的投资可以防止石油供给的中断。踌躇数年后,中国公司开始在 2004 年建立第一阶段的战略石油储备点,2006 年中国在镇海开始

Michael Wesley, "The Geopolitics of Energy in Asia," in Michael Wesley, ed., *Energy Security in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07, pp. 1 - 12; William T. Tow, "Strategic Dimensions of Energy Competition in Asia," in Michael Wesley, ed., *Energy Security in Asia*, pp. 161 - 173.

Philip Andrews-Speed, "China's Energy Policy and its Contribution to International Stability, Facing China's Rise: Guidelines for an EU Paper," *Chailot Paper* 94, December 2006, p. 73; Andrew Andrews-Speed, Xuanli Liao, Roland Dannreuther, et al., *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China's Energy Nee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9.

Francois Godement, Francois Nicolas and Taizp Yakushiji, et al., *Asia and Europe 3/ Cooperating for Energy Security*, Tokyo: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2004, pp. 9 - 28; Christian Constantin, "Understanding China's Energy security," *Worl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3, No 3, 2007, pp. 1 - 30.

Ziad Haider, "Oil fuels Beijing's New Power Game," *Yale Global*, 11 March, 2005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9, p. 105; Joseph M. Grieco,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 Europe, America and Non-Tariff Barriers to Trad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3, p. 10.

Erica S. Downs, *China's Energy Security*, pp. 30 - 36

Erica S. Downs, *China's Energy Security*, pp. 37 - 41

为第一个储备点注油。中国政府也强调国际合作的重要性与增加国内外勘探新储备油田的投资。

与现实主义者相对照,自由主义者重视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性,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从正和博弈而非零和博弈的角度来审视国际政治。简言之,自由主义研究途径具有三个特征:交往的多渠道、军事能力重要性的减弱和问题的非等级。

《壳牌石油公司 2025 年前的全球前景报告》(Shell Global Scenarios to 2025 report)全面阐释了能源安全的战略与市场研究途径之间的关系以及新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的争论。报告把经济效率、硬安全与软安全三角关系描述为三种情形(scenarios),称之为低信任度的全球化、门户开放与旗帜。报告接着阐述了这三种情形之间的相互作用。

第一,在“低信任度的全球化”的情形中,“政府在国家安全保障与市场信任维持机制的监管上扮演主要的角色”,实际上,经济效率与安全之间的权衡(trade-off)在这种情形中起着主要的作用。能源安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寻求多元供给与减少外在冲击的脆弱性的积极政策(proactive policies)来获得的。政府实施鼓励能源在来源、类型与组合上的多样性政策,以减少对那些具有高地缘政治风险地区的依赖。

第二,在“门户开放”这一受新自由主义启发的情形中,国家通过整合力量来减少紧张关系、促进发展并为纯粹的市场活动创造空间。“通过建立安全与信任机制的网络使信任与安全的双重危机得到了解决,或者得到了控制。”消费者与生产者寻求达成双赢,交易重点关注绝对收益,这与低信任度的全球化情形所强调的相对收益是截然相反的。因此,能源安全在很大程度上是投资的安全,在这一情形中,最重要的是在经济效率与创造清洁、安全环境之间达成平衡。

第三情形被称为“旗帜”,强调以经济效率为代价的安全与共同的准则。所谓能源安全的“旗帜”是指多大多数生产国会选择一系列国家主义或民粹主义目标,从而使得市场碎片化了。全球一体化带来的机遇有时会因为社会稳定或国家主权的利益而被故意抛弃了。在“旗帜”情形中,政府达成双边协议,消费国鼓励它们的国家能源公司签订长期购买协议(需求安全)以保障供给安全。因此“旗帜”是这样的情形,即能源安全几乎变成了外交与军事关系的常规部分。

正如壳牌公司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不同的情形不仅仅代表着独特的“故事”,也阐明了相互间的作用以及推动能源领域内的变迁与发展的复杂环境。诚然,这些情形为我们提供了考察不同区域或不同环境下各种条件的背景。通过提出这三种情形,壳牌公司报告中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是清晰的。据此,我们可以把“低信任度的全球化”情形以及“门户开放”情形分别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框架联系起来。然而,“旗帜”情形在理论上的研究还不够充分,本文以对冲与风险管理取代之,以便为中国能源安全政策提供一个可替代的,并且更加全面的概念化框架(conceptualisation)。

我们认为,对能源安全政策更加细致的理解需要一个更加精致的理论框架并超越传统的研究途径,进而来探究这些途径之间的张力,而对冲与风险管理提供的正是这样的视角。然而,在考察如何用对冲与风险管理来理解中国能源安全政策之前,我们需要承认这个具有创新性的研究途径是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争论与更加广泛的批判中发展而来的。多年来,大量的开拓性的国际关系分析视角已经向传统的研究途径发起挑战,从而开辟了世界事务研究的新天地,并体现在下列领域中:批判性安全研究、后现代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研究、建构主义、批判建构主义与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

为了对新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争论加以评估,我们选择了安全化研究框架的解释力。当然,安全化研究框架不仅仅旨在“拓展安全的议程(如一些领域的安全状态,经济、环境与社会领域的具体指

Gabriel Collins, "China Fills First SPR Site, Faces Oil, Pipeline Issues," *Oil & Gas Journal*, 20 August, 2007.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77, p. 24.

Shell International Limited, *Shell Global Scenario to 2025*, [http://www-static.shell.com/static/aboutshell/downloads/our\\_strategy/shell\\_global\\_scenarios/shell\\_energy\\_scenarios\\_2050\\_2008.pdf](http://www-static.shell.com/static/aboutshell/downloads/our_strategy/shell_global_scenarios/shell_energy_scenarios_2050_2008.pdf)

Shell International Limited, *Shell Global Scenario to 2025*, pp. 12 - 13.

Shell International Limited, *Shell Global Scenario to 2025*, p. 14.

Shell International Limited, *Shell Global Scenario to 2025*, p. 37.

Shell International Limited, *Shell Global Scenario to 2025*, p. 3.

Shell International Limited, *Shell Global Scenario to 2025*, p. 16.

Shell International Limited, *Shell Global Scenario to 2025*, pp.

37 - 38.

涉对象),”绝大多数对传统研究途径的批评还应强调拓宽我们对安全的理解,并超越安全研究中军事与国家中心主义的视野。这些批评应集中于对安全问题进行归类,分析什么是安全问题,什么不是;哥本哈根学派在能源问题如何被“安全化”的探究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新起点。此外,迄今为止,很少有运用安全化框架来分析中国能源安全政策的研究。

正是考虑到处在这样的一个研究阶段,澄清能源安全的内涵或许有价值。能源安全常常被界定为“能源总是以各种方式、充分的数量且以可承受得起的价格而被获得。”这样,能源安全表现在实物的可获得性与经济上的可承受性两方面。正如国际能源署(IEA)所说的那样,“能源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经济增长和人类发展的必需品。”然而,在很多境况下,不同国家、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其能源安全是不同的,更无需说是能源的进口国与出口国之间。这个定义在解释能源处于什么条件下以及怎样变为安全问题上依然是模糊的。

是不是因为能源短缺导致了各国在能源获取方面的竞争与不安?是不是上升的石油价格引发了经济危机、衰退和社会的不稳定?或者,是不是能源安全关联到恐怖分子袭击的危险与重要交通路线的封锁这样的未来情景?所以,正如约翰·米切尔(John Mitchell)指出的那样,单纯的能源安全定义并不能充分地理解能源安全本身。研究者也许应该设问:谁的安全?安全防范的对象是谁?如何确保安全?换句话说,我们需要确定原油的基本需求是怎样以及为什么会被理解为一个安全问题。

### 三 能源安全与安全化框架

安全化理论主张研究那些特定的问题是如何被建构成安全问题的,这一过程是如何发生的。运用安全化理论,我们可以考察能源问题是如何被建构成关乎“国家安全”,进而超越市场机制和常态(或“低级”)政治的范围被提升进入到紧急状态或“高级”政治的领域。安全化研究旨在更加准确地理解这些问题,即“谁(who)把“什么(what)问题安全化为“谁(whom)”(指涉对象)的安全?“为什么(why)要这样做?会导致“什么后果(what results)”?“在什么条件下(under what condition)安全化才能成功?这个分析框架为挑战传统的“市

场”或“战略”研究途径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步,也不可避免地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争论联系在一起。

按照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迪·怀尔德(de Wilde)的观点,安全化行为包含三个步骤:确认对某一类型指涉对象现实的生存威胁;需要对受威胁的指涉对象采取特别的保护措施;使跨越政治程序与规则范围的行动正当化与合法化。

据预测,随着中国越来越依赖于海外石油供给,石油进口会从2006年的350万桶/日激增到2030年的1310万桶/日,进口在预期需求中的份额将会从50%上升到80%,可靠的石油进口问题被理解为事关国家安全的大事,并在中国政治话语中得到显著的体现。在2003年11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反复强调石油是战略关注的一大领域,并用安全的词汇清晰地阐明了中国

Barry Buzan, Ole Wæver, and Jaap De Wilde, eds.,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8, p. 1.

Philip Andrews - Speed, et al., *The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China's Energy Needs*, p. 13.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World Economic Outlook 2007*, pp. 160 - 161.

Barry Barton, Cathrine Redgwell, Anita Ronne and Donald N. Zillman, "Introduction," in Barry Barton, Catherine Redgwell, Anita Ronne and Donald N. Zillman, eds., *Energy Security, Managing Risk in a Dynamic Legal and Regulatory Environ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3 - 13, p. 5.

Yang Lu, "The Idea of Securitization: Copenhagen School's Rhetoric or a Panacea of Understanding Sino - Iran Energy Relationship," Paper Presented at an Energy Seminar at the Norwegian 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27 October, 2007.

Kenneth Lieberthal and Mikal Herberg, "China's Search for Energy Security: Implications for U. S. Policy,"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NBR) Analysis*, 2006, p. 13, <http://www.nbr.org/programs/energy/>.

Barry Buzan, et al.,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p. 32; Holger Stritzel, "Toward a Theory of Securitization: Copenhagen and Beyond,"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3, No. 3, 2007, pp. 357 - 383; Ole Wæver, "Securitization and Desecuritization," in Ronnie D. Lipschutz, ed., *On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46 - 86; Mikkel Vedby Rasmussen, "Flexible Security: NATO and International Risk Society," *Milennium*, Vol. 30, No. 2, 2001, pp. 285 - 309.

Barry Buzan, et al.,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pp. 21 - 26.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World Economic Outlook 2007*, pp. 44 - 45.

石油的依赖性。考虑到“马六甲困境”——中国80%的石油进口都要通过马六甲海峡,就像崔大伟(Zweig)和毕经海指出的那样,中国领导人担心“某些大国(可解读为美国)不断地挤占并试图控制该海峡的航海权”。

从各种角度来看,中国政府认为能源是一种“脆弱性的战略资源”,因此也是“高级政治”。中国决策者的能源安全观集中在石油的充分供给上,并把它视为保持经济持续增长、促进军事现代化和巩固既有大国地位的必要前提。合理的燃料价格也是社会长期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政府认为石油的安全供给是其核心目标的决定性要素,对执政党的合法性至关重要。概言之,能源短缺会危害到经济增长并带来社会的不稳定,这种担心形成了这样的认识,即能源过于重要而不能完全置于市场来解决。

由此可见,能源供给对持续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对能源供给的依赖也就可以被视为一种“现存威胁”。按照哥本哈根学派的观点,如果某一个具体问题被视为是一种现实存在的致命威胁,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处理这个问题,其他的所有事情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们将无法生存,或者我们将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自由地处理它)。”这一解释使采取非常手段来应对能源供给中断的保护措施合法化了。因此,石油安全运输的重要性便可用来合理解释中国与“流氓国家”的关系了,也可为发展海军力量提供合法性依据,因为这可以为重要的海上交通线提供安全保障。

通过把能源安全置于紧要 and 优先的地位,中国领导人便可以把能源安全框定为一个“国家安全”问题,这样就为打破常规程序提供了理由。根据哥本哈根学派的想法,从常态到紧迫是一种安全化过程。如姜闻然所说,中国的能源寻求不仅仅是经济层次上的,“它关系到中国整体发展战略,关系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方向,关系到中国作为世界性大国的自身定位,最终它也关系到中国能否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然而,一些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近年来中国正逐步从战略途径转向更多地采取市场机制的办法。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中国逐渐认识到,以石油所有权为核心的战略途径今后并不能确保中国所追求的能源安全(即石油的安全供给)。

根据欧亚集团的预测,中国国内产量(目前的

实际产量是380万桶/日)将继续保持相对平稳或略有下降的态势。米凯尔·E·赫伯格(Mikkal E. Herberg)估计,中国石油需求正以大约每天50万桶的速度在逐步增加,每年都会翻一番,且这种增长量不得不靠进口来填补。相对于现在的350万桶/日,在未来五年里,中国的进口量大约是650万桶/日。最佳的考虑是,中国的国家石油公司期望在这五年里每天增加50万桶海外股本原油生产,中国石油进口需求以五倍于中国石油公司股本原油增速的速度增长。因此未来的石油供给最终源自于市场而不是股权。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决策者已经认识到股本原油与能源安全没有关系。股本原油份额的获得并不必然提升能源安全。唐斯简洁明了地指出,“股本原油的吸引力说明不了什么”。<sup>⑩</sup>

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石油公司也逐渐懂得国际石油市场的运行机制。赫伯格指出,石油总是会有的,关键的是价格。在过去的六年里,中国经济拉动石油价格增长了三倍多。此外,在制定国际能源市场的战略上,备受非议的中国国家石油公司的“走出去”战略与主要的西方石油公司和亚洲其他石油公司所采取的战略没有什么不同,来自国内的经济与

David Zweig and Bi Jinhai, “China’s Global Hunt for Energy,” *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 5, 2005, pp. 25 - 38.

Zweig and Bi, “China’s Global Hunt for Energy,” pp. 25 - 38.

Frank Umbach, “Global Energy Supply and Geopolitical Challenges,” in Francois Godement, et al., *Asia and Europe - Cooperating for Energy Security, A CAEC Task Force Report*, pp. 137 - 168.

Downs, *China’s Energy Security*, p. 225.

Mikkal E. Herberg, Statement before the U. S. -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Hearing on “China’s Energy Consumption and Opportunities for U. S. - China Cooperation to Address the Effects of China’s Energy Use,” 14 - 15 June 2007, p. 102.

Buzan et al., Buzan, et al.,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p. 24.

Zhang Wenmu, “Sea Power and China’s Strategic Choices,” *China Security*, Summer 2006, pp. 17 - 31, [http://www.wsichina.org/cs3\\_2.pdf](http://www.wsichina.org/cs3_2.pdf); Andrew Erickson and Gabe Collins, “Beijing’s Energy Security Strategy: The Significance of a Chinese State - Owned Tanker Fleet,” *Orbis*, Fall 2007, pp. 665 - 684.

Wenran Jiang, “Fuelling the Dragon, China’s Quest for Energy Security and Canada’s Opportunities,” pp. 4 - 5, <http://www.uofaweb.ualberta.ca/chinainstitute//pdfs/FUELLINGTHEDRAGON.pdf>

Mikkal Herberg, “China’s Energy Consumption,” *NBR Analysis*, 2006, p. 20.

<sup>⑩</sup> Erica S. Downs, “The Chinese Energy Security Debate,” *China Quarterly*, No 177, pp. 35 - 36.

外交支持并不鲜见。

在很大程度上,中国国家石油公司采取的是来自西方的商业战略模式。作为国际能源市场的后来者,中国国家石油公司主要关注的是获得海外能源生产与资源勘探权,在某些案例中,它们付出成本的比西方石油公司预期的要多。但在进入市场的早期阶段,某些损失是可以接受的。然而,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国家石油公司现在已走向下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它们会越来越关注商业机遇、生产量的增加与利润。查道炯认为,中国能源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市场准入与利润,而安全问题是次要关注。应把中国石油进口的增长视为一种正常现象,是中国与外部世界不断增长的互相依赖的部分表现。如他所言,“中国对海上能源运输的依赖是管理事务的正常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家石油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早中期实施的“走出去”战略,与中国经济的总体开放以及对贸易和市场准入的强调是同步的。中国政府肯定支持了这一进程,但很少有证据表明:在追求关乎能源安全的“国家利益”时,中国的能源安全政策是高度协调的,并具有界定清晰的战略目标。相反,大量的研究指出中国缺少能源安全政策的指导性纲领,中国确保石油进口的战略具有滞后性、被动反应性和多元性的本质特征。因此,一些研究者指出,20世纪80年代末,肯尼思·利伯索尔(Kenneth Lieberthal)与米歇尔·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提出的“分散化的权威主义”模型是一种描述中国能源安全政策决策过程的有用工具,该模型强调官僚机构之间的竞争,把决策解释为从国家机构到各个省份的领导人及其代理人网络之间斗争的结果。

中国能源安全政策被描述为一组“易变的并且联系松散的动议”,而且其决策过程受到“效率低下的制度与有实力的大公司”的暗中破坏。因此,唐斯认为,“是中国能源公司的法人利益而不是中国政府的国家利益影响中国能源规划与议事日程,结果就是各干各的。”因此,新成立的由温家宝总理领导的能源领导小组以及非常令人期待的《能源法》是否能够加强中国的能源决策机制,仍有待观察。简言之,能源安全的传统研究途径与安全化研究框架很难涵盖中国能源安全政策的微妙和复杂性。

哥本哈根学派认为,“把某些事情说成是对一

个指涉目标的现存威胁,这种话语方式本身不会造成安全化,它是一个安全化的步骤,只有听众接受了这种认识时,这个问题才被安全化了。”正如上文所陈述的那样,政府的高级代表和政治评论家已经用安全的话语陈述了中国的能源政策,因而这些问题变成了安全化的一个步骤。例如,石洪涛宣称,“毫不夸张地说,谁控制了马六甲海峡,谁就掐住了中国能源路线的咽喉。过分地依赖这个海峡会给中国能源安全带来潜在的重大威胁。”

然而,如果由此就进一步认为“听众”已经认可了“能源是一个带来实际威胁因而需采取特殊应对措施的安全问题”这样一个观点,那么,这种理解是非常成问题的。查道炯认为,中国的(能源上的)对外依赖是一种正常现象,安全问题是处在第二位的。因此,由于运用了传统的研究路径,中国能源安全政策的辩论往往以介于安全化、去安全化与“战略”或“市场”思想之间的某种立场而告终,为了摆脱这种具有“飘忽不定的中间道路”特点的分析方式,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理论框架,需要更多地关注“威胁”与“风险”之间的区别。

---

Esther Pan, “China, Africa, and Oil,”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Background*, 26 January 2007, <http://www.cfr.org/publication/9557/>.

Satu P. Limaye, “The United States and Energy Security in the Asia - Pacific,” in Michael Wesley, ed., *Energy Security in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04, pp. 15 - 27; Erica S. Downs, “The Chinese Energy Security Debate,” pp. 21 - 44; John Mitchell and Glada Lahn, “Oil for Asia,” *Briefing Paper*, Chatham House, March 2007.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Zha, Beijing, November 2007.

Zha Daojiong, “Energy Interdependence,” *China Security*, Vol 2 No 2, 2006, pp. 2 - 16.

Kenneth Lieberthal and Michel Oksenberg, *Policy Making in China: Leaders, Structures, and Process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Susan Shirk, *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Kenneth Lieberthal and Mikal Herberg, “China’s Search for Energy Security: Implications for U. S. Policy,” *NBR Analysis*, Vol 17, No 1, p. 17.

Erica S. Downs, “China Energy Security Series,” p. 66

Bary Buzan, et al., *Security: 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 p. 25.

Quote taken from, U. S. -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China’s Energy Consumption and Opportunities for U. S. - China Cooperation to Address the Effects of China’s Energy Use,” [http://www.uscc.gov/hearings/2007hearings/hf07\\_06\\_14\\_15.php](http://www.uscc.gov/hearings/2007hearings/hf07_06_14_15.php).



#### 四 进入未知的世界： 对冲与风险管理

大量的研究折中地 (eclectically) 借鉴了乌尔里克·贝克 (Ulrich Beck) 的风险社会、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的反思性现代性 (reflexive modernity) 以及福柯 (Foucault) 强调的“治理性 (governmentality) 等思想, 运用风险概念来分析新安全挑战, 如恐怖主义、移民、环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等。此外, 风险分析框架最近也运用到了安全领域。本文认为这种分析框架也适合于能源安全。在提出理论假设之前, 我们还是从风险与威胁两者之间的差别的详细探讨开始。

“威胁 (threat) 是一个能够以实力和意图为基准加以辨认和衡量的特定危险 (danger)。如拉斯马森 (Mikkel Vedby Rasmussen) 所言, 风险所涉及的是正在演进中的危险, 风险从来不是一个现存的危险: 仅仅当人们预测它将在未来导致某种后果时, 它才会成为一个危险 (danger)。我们很少依据现在的情况而更多地依据可能突然发生的情况来持续不断地评估风险, 概率性的风险估计有助于我们避开尚未发生的不利后果。

风险总是指向未来的, 因此行为的后果尚未显现出来。按照贝克的观点, “还未发生的未来事件成了现在行动的依据”, 贝克称之为“真实虚拟 (real virtuality)”。因此, 确保充足的能源供应成为中国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 这不是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实实在在的威胁, 而是因为未来的一场危机或冲突中美国或其他大国可能中断中国的石油供应这种情形变成一个“真实虚拟”。因此, 风险管理聚焦在如何避免这一情形成为现实。

简单地说, 威胁激发了能源安全的战略研究途径, 而需要管理的风险带来的是对冲选择 (hedging behaviour)。对冲是一种旨在处理风险而防御危险的管理战略。安全领域的对冲是一种在未来避免威胁来处理风险的战略。也就是说, 在安全研究中引入对冲与风险管理, 这为超越依赖于外在威胁和处理这些威胁的特殊措施上的安全化框架提供了一条思路。处理风险与对冲的要点是判断与解释。决策者需要选择什么样的风险是他们要避免的, 什么样的风险是他们不得不接受或需要对冲的。根据诸如吉登斯和贝克等社会学家的观点, 高度现代性或

晚期现代性的特点是, 社会没有能力防范风险从而确保安全。风险从来都不能被消除, 相反, 风险需要管理。“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始终存在的‘及时确定风险’的迫切需要, 排除了我们企图通过管理风险来消除风险的这样一种可能性”。

拉斯马森认为, 处理风险上, 政府不再控制结果, 仅需掌控手段。因此, 中国的能源需求无法变得“安全 (secure)”, 它只能通过决策者处理风险和发展对冲战略的持久能力来加以“确保 (insured)”能源安全的核心在最新的《世界能源展望 2007, 中国与印度探索》(World Energy Outlook 2007: China and India Insights) 中得到了简洁的说明, 国际能源署在该展望中表示, “没有一个能源体系是完全安全的……能源安全, 在实践上最好视之为风险管理问题, 即将供应中断的风险与后果以及长期市场的不利趋势减少到一个可以接受的程度。”贝克把“风险”定义为一套处理由现代化本身所引发和导致的危险和不安全的系统方法。中国无疑在综合国力上会变得更加强大, 与此同时, 中国也会变得越来越脆弱。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额外的资源。拓展与世界的联系意味着中国已经扩大了需要充分维护的利益范围 (portfolio of interests)。中国要根据其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来调整战略。一种可能的选择就是发展强有力的军事能力来保护利益, 但是这种政策会遭到美国、印度、日本的反对, 加剧该地区的安全困境。

Yee - Kuang Heng, *War as Risk Management: Strategy and Conflict in an Age of Globalised Risks*,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 10.

Yee - Kuang Heng, *War as Risk Management: Strategy and Conflict in an Age of Globalised Risks*, p. 32.

Mikkel Vedby Rasmussen, *The Risk Society at War: Terror, Technology and Strategy in the Twenty - First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38.

Øystein Tunsjø, *US Taiwan Policy: Constructing the Triangle*, London: Routledge, 2008, p. 116.

Mathias Albert, “From Defending Borders towards Managing Geopolitical Risks? Security in a Globalized World,” *Geopolitics*, Vol 5, No 1, 2000, p. 64.

Mikkel Vedby Rasmussen, *The Risk Society at War: Terror, Technology and Strategy in the Twenty - First Century*, p. 37.

IEA, *World Energy Outlook 2007: China and India Insights*, p. 161, <http://www.worldenergyoutlook.org/>.

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2.

Yang Yi, “Engagement, Caution,” pp. 29 - 39, [http://www.wsichina.org/cs8\\_2.pdf](http://www.wsichina.org/cs8_2.pdf)



另一种选择是确保资源需求的安全战略,但是如上所述,控制股本石油的战略方式不是保障中国能源需求安全的充分条件。最后一个可选择方案是依靠市场机制,不过美国在世界能源市场和交通运输线上的支配地位,会使中国处于不利的地位。

唐斯与其他研究者一样,他并不认为中国的能源安全政策是由“战略”主导的(即通过紧急措施确保供应安全)或者主要是由市场机制所主导的,相反,他认为中国的能源安全政策表现出“战略”途径与“市场”途径之间的张力。唐斯的观察对本文观点的论述具有重要意义。的确,唐斯曾经指出:“中国石油净进口国地位对国家安全的潜在不利影响,将刺激中国采取对冲措施来减少对市场(确保能源安全的渠道之一)的依赖。”唐斯还指出:“中国越是觉得受到美国的威胁,越有可能采取对冲战略来降低对石油供应(易受美国权力的不利影响)的依赖。”

把对冲作为中国处理能源安全的战略是一种很普遍和流行的观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分析家们主张中国应通过与产油国、中国石油进口的海上和陆地运输线上的国家建立紧密的关系来对冲在能源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另一位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在论及能源安全问题时强调“中国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迈克尔·韦斯利(Michael Wesley)等人认为,“中国正在权衡防范供应中断的各种战略”,并认为中国“正在对完全依赖市场的能源安全机制采取对冲战略”。

尽管通过期货合约来规避价格风险与波动的做法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已经成为国际石油市场的惯常行为,并且一些学者正开始把中国的能源安全政策称之为“对冲”,但是,很少有分析家详细阐述过“对冲”概念的内涵。更加重要的是,没有相关学者对对冲进行理论在能源领域的运用进行深入研究,这个概念发端于财政与经济学,运用到安全领域以解释能源安全问题,因此,在我们运用“对冲”概念来富有成效地理解能源安全之前,我们需要进一步澄清这个概念。

如好几位论述者所说的那样,对冲“是一个公认的难以理解的概念”,也是“一个被国际观察家广泛运用并赋予不同内涵的术语”。罗伯特·J·阿特(Robert J. Art)运用此概念来理解欧洲安全环境,伊夫林·戈(Evelyn Goh)把对冲作为分析框架来探究东南亚国家在处理与中国和美国关系上所面

临的挑战。罗斯玛丽·富特(Rosemary Foot)用对冲概念研究了当代中国外交政策,其他研究者也关注过这一概念如何被运用到美国的对华政策,并视之为传统遏制政策与接触政策之间的中间立场。笔者认为,对冲的概念超越了美国围绕什么是应对中国崛起的最佳战略所展开的辩论,即这种战略应是遏制战略还是接触战略。

伊夫琳·戈(Evelyn Goh)认为,对冲就是“一整套战略,意在避免这样的一种情况,即政府无法在制衡、追随(bandwagoning)与中立等方案中做出更加直截了当的选择。在对冲战略中,“国家坚持一种中间立场,预防或避免出现国家不得以牺牲一方为代价来选择另一方(即一种明晰的政策立场)的不利情况。”<sup>⑩</sup>由于我们不清楚究竟是“战略”途径还是“市场”途径是提高中国能源安全利益的最佳办法,对冲战略要比传统途径创造出更多的策略空间与更大的弹性。

“对冲”是一种旨在把遭受不利风险的可能性降至最低程度的战略。例如,中国经济过分依赖石油进口,但中国依然能在深入发展的全球化与互相

Erica S. Downs, *China's Energy Security*, pp. 45 - 46.

Erica S. Downs, *China's Energy Security*, p. 49.

Erica S. Downs, "The Chinese Energy Security Debate," p. 41.

Erica S. Downs, *China's Energy Security*, p. 77.

Michael Wesley, *Energy Security in Asia*, pp. 1 - 12; Tow, "Strategic Dimensions of Energy Competition in Asia," p. 165.

Evelyn Goh, "Understanding 'Hedging' in Asia - Pacific security," *Pacific Focus CSIS*, 31 August 2006; Robert Sutter, *China's Rise: Implications for US Leadership in Asia*, Washington, D. C.: East - West Center Washington, 2006, pp. 1  $\frac{3}{7}$  77.

Robert J. Art, "Europe Hedges Its Security Bets," in T. V. Paul, James J. Wirtz, and Michel Fortman, eds.,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 21<sup>st</sup> Centur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79  $\frac{3}{7}$  213.

Rosemary Foot, "Chinese Strategies in a US - Hegemonic Global Order: Accommodating and Hedging,"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2, No. 1, 2006, pp. 77 - 94; Medeiros S. Evan, "Strategic Hedging and the Future of Asia - Pacific Stabilit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9 No. 1, 2005/2006, pp. 145 - 167; David Shambaugh, "Asia in Transition: The Evolving Regional Order," *Current History*, Vol 105, Issue 690, 2006, p. 156.

Øystein Tunsjø, *US Taiwan Policy: Constructing the Triangle*, London: Routledge, 2008.

⑩ Evelyn Goh, *Meeting the China Challenge: The U. S. in South-east Asian Regional Security Strategies*, Washington: East - West Center Washington, 2005, pp. 1  $\frac{3}{7}$  57.

依赖的世界里获利和发展。简言之,中国决策者需要认识到市场与战略途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客观理解风险与回报间的关系。

与金融学和经济学中的对冲战略相反,当发展对冲战略时,中国的能源安全政策体现出对市场机制的不信任以及对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优势地位的厌恶。因此,中国无法充分相信国际石油市场,而更愿意采取“对冲”行为,例如,针对由于美国在海上交通运输线中占支配地位所带来风险,中国采取对冲战略规避对美国 and 海上航线产生的依赖。在许多方面,中国更愿意采取如下措施来确保自身的利益不受到美国权力潜在的不利影响:与石油输出国和战略要冲国建立更加紧密的外交联系,提高海运能力,通过在邻国和世界事务中的重要“玩家(player)获得更大的影响力来扩充其实力。

一些人可能会认为绝大多数国家采取的都是一种综合的能源政策,兼及市场与战略因素,但是对冲概念与风险管理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严谨的理论框架,该框架重点放在国家如何寻求“对冲比率与增值”上,也就是说,为抵消“短线(shorts)”(战略途径的负面影响)而需要的“长线数(longs)”(中国在世界能源市场中是依赖市场机制一个关键的利益相关国)。可见,对冲不同于传统途径,不同于安全化理论,也不同于把战略与市场途径松散地混杂在一起的综合研究途径。通过整合那种关注于机会损失的管理学视角,对冲战略可以适用于那种需处理风险而非威胁的不确定的情势。

## 五 结论

为了解释中国的能源安全政策,本文采取了三个颇具新意的步骤,并建立了一种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第一步是把研究能源安全问题的传统的“市场”或“战略”方法,与国际关系理论中新现实主义同新自由主义之间更为广泛的辩论结合起来,通过借鉴哥本哈根学派及其安全化的研究成果来批判这种传统的研究方法。安全化理论框架虽也被用来批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争论,但是很少有学者用它来解释能源安全并进一步运用到中国的案例中。

第二步是表明安全化的分析框架不能充分完整地解释中国的能源安全政策。安全化理论框架的缺陷在于它没有关注威胁与风险之间的区别,而这

点在中国为保证自身能源供给安全而采取的措施中得到例证。总之,传统的研究方法和安全化的分析框架不能提供我们所需要的理论工具来考察市场途径与战略途径之间复杂的紧张关系,或者来阐明安全化与去安全化之间所留下的“真空(void)”。

第三步是引入“对冲”概念和风险管理理论作为一种超越传统研究方法的替代框架来理解中国的能源安全政策。一小部分学者已经引入“对冲”概念来描述中国的能源安全政策,但是详细阐述“对冲”概念的研究并不多见。更重要的是,目前就笔者所了解的,还没有学者试图把“对冲”概念与风险管理理论结合起来,进而探讨这种分析如何能够解释中国的能源安全政策。

对冲战略并不仅仅适用于中国的情况,其他国家肯定也会在他们的能源安全上两边下注。但是源自经济理论的对冲战略取决于分析家与利益相关者的偏好:一些是风险接受者,另外一些则是风险规避者。换句话说,不同国家间的能源安全政策中的对冲比率与德尔塔套期保值不同,他们的评估与管理风险的能力是不同的,他们保障自身利益的、避免机会流失的交易能力也是不同的。本文进行了概念澄清,以便于区分和阐明透视中国能源安全政策的新视角。但是,为了获得更深入的理解,我们需要做更加仔细的经验分析,以评估本文所提出的上述三个颇有创新的理论步骤。

总之,中国在能源安全领域所实行的对冲战略,其核心特征是与这样一个事实联系在一起的,即置身于由全球化和不断加深的相互依赖所塑造的后冷战时代的战略环境之中,中国无法确定是“战略”途径还是“市场”途径能够保护中国的能源安全利益。当国家感知到不确定性时,它们就会为了自身的安全而两边下注或者实施保障政策,从而预防机会损失并管理风险,而不会以明显地牺牲一种战略为代价来选择另一种战略。

(安庆师范学院讲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赵俊译)

[来稿日期:2008-05-3]

[修回日期:2008-06-28]

[责任编辑:赵远良]

ket, and China, the fastest-growing economy, can provide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and generate benefits of scale which will lower the costs of climate-friendly goods and services globally. The effective collabo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could become the de facto engine of global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and contribute to the mitigation of the worldwide global warming process. The EU-China interdependence on both climate and energy security have laid a foundation for future cooperation. Based on an in-depth analysis of EU-China collaboration in various sectors such as electricity, buildings, transport, trade and investment, the author provides a blueprint that both China and EU develop into a low-carbon economy and offers relevant policy suggestions.

### **Rudd Kevin Government's Climate Change and Energy Policy**

**Zhou Jian He Jiankun** (33)

Based on Rudd Kevin's campaign manifesto, policies of the new government and Gamaut's Climate Change Review Interim Report,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climate change and energy policies of Rudd Kevin government and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changes. First, Australia has turned to make a balance between the U. S. and EU from simply following the U. S.; Second, it adheres to the "limited distinction" and cooperation policy with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hird, it still follows Howard government's policy in many aspects because both of them aim to maximize the national interests. Given such new trends, measures are recommended to the Chinese policy makers.

### **China Hedges its Energy Security Bets**

**Øystein Tunsjø** (42)

This article seeks to establish a new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at encapsulates some of the complexity that is lost in the void between traditional "strategic" and/or "market" approaches to China's energy security policy, by introducing the concept of hedging and the theory of risk management. The analysis applies the concept of hedging as a reflexive and contingent strategy that combines elements of cooperation, rivalry, friction and potential conflict simultaneously and which aims to minimize risk and insure against a state of emergency. The article first explores the "strategic" and the "market" approach and links this framework to the debate between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with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t is then argued that we need to transcend these traditional approaches, and 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usefulness of the securitization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China's energy security policy. Aiming to go beyond criticism of the neorealist and neoliberalist debate and pointing out that the securitization framework remains insufficient in explaining China's energy security policy, the final section explores how the concept of hedging and the theory of risk management can provide a more nuanced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energy security policy.

### **China's Energy Security: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Yang Zewei** (52)

The viewpoints on China's energy security has undergone a process from "self-sufficiency" to "supply-oriented" and to current "broadening supply and conservation". Now, China's energy security is facing structural and insti-